

# 东 方 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志:从红海到中国/(葡)皮列士著;何高济译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8

(西方文库.学术译丛)

ISBN 7-5343-6552-X

I. 东...

II. ①皮... ②何...

III. 游记—东南亚

IV. K933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8526 号

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东方志:从红海到中国

作 者 [葡]多默·皮列士

译 者 何高济

责任编辑 王 展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—3685460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9.5 插页 2

字 数 311 000
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100

定 价 26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—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—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中译者序

葡萄牙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使者多默·皮列士,来华之前于 1512—1515 年在马六甲撰写有《东方志》一书。这是最早记述东方诸国的珍贵地理文献,但长期湮没无闻。后来经葡萄牙学者科提松不断寻找,终于 1937 年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原稿,它与另一位葡萄牙海员罗德里格的《航海志》被收编在一份古抄本内。科提松将它和罗德里格书译为英文,详加考释,连同葡文原稿,由哈克鲁特学会出版。鉴于这部史书的重要性,科提松将葡文稿加以整理编辑,增补了若干注释,由哈克鲁特学会再单独付印。自从达·伽马打通印度洋航道后,葡人继续向东航行,终于驻足中国海岸。葡萄牙殖民者、商人、传教士陆续沿这条航路来到东方,有的踏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们从亚洲写回本国的信函、报告以及记录,是研究葡萄牙海外殖民历史,也是研究这个时期亚洲诸国历史的重要资料。其中,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成书最早,记述翔实全面,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史料。

我国和东南亚、印度洋上诸国自古就有交往,我国史书中对这些国家早有著录。但是直到宋代周去非撰的《岭外代答·外国门》和赵汝适的《诸蕃志》出版,才算有了最早对这个地区作出较完整报道的著作。继之有元代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,其记述较前更为广泛和详尽。明代郑和下西洋,随行的马欢撰有《瀛涯胜览》,记途经各国的风土人情,真实有趣。再有费信的《星槎胜览》,巩珍的《西洋番国志》,以及后来张燮的《东西洋考》、《海语》、《海录》等。这类记述,其史料价值是可以肯定的,但总的来说有两个缺点:一个是有的撰述者本人并未亲身出海或者经历各国,而是根据海商番客的口述加以笔录,如周去非、赵汝适;另一个是,本人虽曾亲历诸国,却未能科学地按航路的顺序准确地记述,突出的例子是《岛夷志略》,我们不清楚汪大渊确实走过的路线,他记述的地方也缺乏前后应有的顺序。因为这两个缺点,有时难以考证诸书记录的地方,同一个地方往往出现不同的名字和记述。

皮列士旅行过印度、马六甲及苏门答腊等地。他的记载大多是据亲身的见闻,或者是在各地采集到的情报。他记录的从红海到中国的路线,正是葡人走过的航道,其中都是按经行各国的顺序作出描述。这条路线,也是郑和下西洋从另一方向所走过的。因此我们利用他的这部《东方志》,与《瀛涯胜览》等中国书作对比研究,可以阐明有关地理方面的问题,提供若干论证,补充许多史实。同时,书中不乏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和亚洲各国交往的报道,尤其可贵的是,皮列士对这个时期中国商品的外销作出了相当详尽的记录。

目前这个中文本系译自《东方志》1944年由哈克鲁特学会出版的英译本,在翻译过程中中译者参照1978年的葡文版,并将增补的注释译出。同时中译者又据有关的中文资料,参照英葡文本,对其中有关史地的问题加以阐明。我相信,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学者对亚洲诸国史的认识。

何高济于北京

2005年1月24日

## 导论 巴黎古抄本

令人惊异的是,像多默·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这样重要的地理史文献——肯定是16世纪上半叶产生的有关东方最重要和完整的记载,尽管它写于1512—1515年——竟湮没无闻,实际上未受注意,直至今日;尤其是,在同一古抄本中,与它同时代的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之书及其珍贵的地图,在上一世纪中却已闻名于世。

桑塔林子爵(Viscount de Santarém)在其1849年最后的地图集中,以总题名为《葡萄牙海员、曾旅行摩鹿加的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,于1524—1530年间绘的海图》,复制了26幅系列地图,但他没有说明地图是从何处得到的。子爵死于1856年,他遗留的有关地理志和制图学的许多笔记,几乎是他毕生在欧洲档案馆——主要是在葡萄牙和法国——搜集采录的,直到1919年才刊行<sup>①</sup>。这些笔记中,在“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的海图”标题下,我们发现了一个对罗德里格书的补充说明,最后极简短地提到了皮列士的《东方志》。其说明并不都正确,然而,它在一个脚注中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,说这份古抄本在他撰写说明时(1850年)属于巴黎的“国民议会图书馆”。1933年为了这份古抄本,我曾致函巴黎,但被告知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,尽管它可能藏于国立图书馆,多半以某个不认识的书名被收编。虽则如此,后来我访问巴黎时,也未能在国立图书馆找到它,在其他公立图书馆也未发现。没有人能够提供它的线索,据认为它已遗失。但我仍未放弃,于是,当我1937年9月返回巴黎时,高兴地在《法国公立图书馆抄本总目录》的“巴黎·众议院”卷第471页发现如下的著录:“1248(ED, 19)。弗朗西斯科·罗伊斯航海日志,发现摩鹿加的葡萄牙船队海员。该书分两部,第一部是海图,第二部包含本人所撰述的文字。封面内页贴有弗列里乌骑士的藏书票。16世纪。纸印。178对开页和124页。380×265毫米。大理石颜色牛皮装订,印有弗列里乌的太阳标记。”罗伊斯(Roïs)是罗德里格(Rodríguez)古代的或简写的拼法。这个记录不很正确,下面将看到这一点,但它把

我引向了这份长时间寻求的珍贵古抄本的埋没之处。

这卷书用镀金牛皮装订,后面印有弗列里乌家族的太阳标记;封面内是“Mr. le Cher. de Fleurieu”,著名法国水形学家孔德·德·弗列里乌(Comte de Fleurieu, 1738—1810)的藏书票,古抄本从前的拥有者。显然它是在弗列里乌手中装订的,但可惜在装订中剪裁不好,某些边注或补释,或地图中部分字词以及大部分原书页码已被切除。书卷除 4 飞页外,是 178 对开页的厚白纸,大小为 263×377 毫米。罗德里格书连同绘图和地图都印在同样的纸张上,占了前 116 对开页;皮列士的占另 62 对开页。178 对开页的纸张是相同的,有同样的水印。

在对开页第 5 行右侧的地方写有 Osorio 的字样,笔迹是后来的,可能是著名主教唐·哲罗尼莫·奥索略(D. Jerónimo Osório)的签名,他是 16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藏书家,显然是这份古抄本早期的拥有者<sup>⑥</sup>。各个抄本均有其原来的对开页数,当装订书时几乎完全被切掉;但仍能看到它的痕迹。而后,皮列士《东方志》中补充了另外的页码,完全是新的,从第 1 页至 178 页,笔迹是现代的,附在全部古抄本上。

前面提到的桑塔林脚注还说:“看来这份珍贵的抄本属于著名的奥索略主教,他的许多抄本是英国人在一艘葡萄牙船上找到的,英人在亚速尔海外俘获了这艘船并把它带到英国。后来它为弗列里乌先生所得。”他又说这个消息是“国民议会图书馆员布里勒(Biller)先生”告诉他的。我不能追寻这个奇特消息的来源。

当提到多默·皮列士时,巴波萨·马夏杜(Barbosa Machado)在其《露西塔纳图书馆》中说,他撰写了“东方志,始于红海海峡,迄至中国,献给唐·若望三世·对开本。抄本”。这多半是一个比巴黎抄本更早的写本,以下我们将看到这一点。尽管说献给国王若望三世,但其统治始于 1521 年,实际上皮列士是要把《东方志》献给国王若望三世的父亲——国王曼内奥一世(Manuel I)。不管怎样,它肯定是另一写本。罗德里格书是他亲自书写的,但皮列士《东方志》则是一个同时代的写本,这不仅有 16 世纪早期的笔迹为证,还有两份抄本确实都用同样的纸张这一事实。此外,在罗德里格书对开页第 5 行右侧处 Osorio 这个字,和写在皮列士《东方志》对开页 118v,124v 等处有关页码顺序的注释,明显地出自同一手笔。可能是罗德里格本人,或至少在他的时代,把这两份抄本集

中到同一古本中；它们必定在 1580 年前为奥索略所拥有时便已在一起。因此巴波萨·马夏杜提到的写本不可能是同一个本子，否则他会提到罗德里格及其著作，但他没有提到。

现在的编本中，尽管两部著作风格迥异，一个是海图、航海指南和地图集，另一个是地理、经济和历史的记录，但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写成，很早就在一起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。我感到高兴的是，哈克鲁特学会执委会同意将它们一起出版，并在英译文之后又按原样刊印了非常难读，但从语源上说又是极有意义的原葡文本，这肯定提高了本版本的价值。

皮列士《东方志》现抄本不是他本人写的原本，抄录者留下了自己疏忽的许多例子。皮列士的文风绝非简明，再加上誊写者的错误、极端混乱的标点符号，或甚至根本没有，使得文字翻译极端困难，有时必须自由地翻译，甚至靠猜测而无其他办法。不管怎样，我始终努力领会皮列士原著的真义，不仅用其他抄本及拉木学的《东方志》部分译文去核对巴黎抄本，还考查上下文和能够利用的其他史料。至于最困难之处，就求教于像亨利·托马斯博士(Dr. Henry Thomas)和艾德加·普列斯塔格教授(Prof. Edgar Prestage)这样有学识的专家学者。即使如此，我仍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达到尽善的翻译；当读者遇到疑问时，有如实刊印的原葡文本可供参考；由此他可以尝试作出更佳的译文，还将发现许多可供研究和讨论的东西。我的责任仅限于此。

由于皮列士的作品更长更重要，所以将其英译文刊印在罗德里格书之前是可取的，因此我颠倒了古抄本中它们的顺序。当两个抄本最初在一起时，《东方志》或是因一些书页放错了地方，或是因这样那样的缘故，文字不是多默·皮列士原来撰写的顺序，在英译文中这些都得到了纠正；但对于原葡文本，则如实按原来实际顺序和安排刊印。无论在英译文还是葡文原文中，都标出了巴黎古抄本的页码，这有助于让读者轻易地找到英文和葡文中相应的部分。至于原文的注释，我不仅试图阐明每个含糊之处，还对某些地理史章节的重要性予以解说和强调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长注。

东方的人名地名，不可能全都考证出来，原葡文中常有不同的拼写法，英文的转写成为复杂的问题。我决定，作为一个总的规则，东方的人名及官职，按原葡文中出现的形式录出，而在脚注中予以阐释，有可能时给出相应的英文形式。至于地名，如能考证出来，并具有相应的英文名，在译文中就采用英文形式；但

地名首次出现,并且当原文中以不同形式重现,或者以后再现,这时原葡文拼写就附在括号内。

在详细叙述《东方志》之前,我先介绍一下多默·皮列士的生平,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介绍弗朗西斯科·罗德里格及其著作。

注释:

① 维斯孔德·德·桑塔林:《古地图学研究》(*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*), I, 148—156 页。(原注)

② 这个假定,尽管很像真的,但仅仅是推测,因为——虽然看来奇怪——至今在葡萄牙或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主教奥索略签署的文献。有另一个哲罗尼莫·奥索略(1545—1611),前者之侄,他是埃塞克斯(Essex)教区的牧师会员,也是一个藏书家。(原注)

## 多默·皮列士传注

和 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在东方的一些卓越历史人物相比较,多默·皮列士显得是一个平凡的人物。同时代在那里生活的人当中,奥布魁克(Albuquerque),船长和行政官,一个大帝国的创建者以及贾梅士(Camoes),葡萄牙诗人之王,歌颂他的国家和同胞的光荣业绩,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。杜阿特·帕切科·伯来拉(Duarte Pacheco Pereira)、唐·若望·德·卡斯特罗(D. João de Castro)以及安东尼奥·高旺(António Galvão),都以船长、行政官和航海家或作家而闻名,加西亚·达·奥尔达(Garcia da Orta)则是作为科学家、加斯帕·哥赫亚(Gaspar Correia)和卡斯特涅达(Castanheda)是作为编年史家而著名。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(Fernão Mendes Pinto)是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家,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有关他惊人历险的奇妙撰述:《远游志》(*Peregrinação*),在他死后 31 年才刊行,有若干改动。许多别的人作为战士、航海家或探险者而获得不朽声名。甚至连杜阿特·巴波萨(Duarte Barbosa)也闻名于世,但他的书是在皮列士已完成《东方志》这部更为巨大的著作后才写成的。原稿已失的巴波萨书,很快被译为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,由拉木学(Ramusio)首次在 1550 年刊印,广为人知,而拉木学只得到皮列士《东方志》的一个次要部分,未提作者之名将它刊行,因为他不知道作者的名字。

皮列士的大作湮没无闻,迄至现在。这位谦逊的药剂师在 1511 年抵达印度,并因他的才能被委以重任,选为葡萄牙首遣中国的大使,大约 1540 年死于中国。实际上他早已被遗忘,尽管他早期对东方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总之,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,而这部《东方志》除了是最早由一个葡人撰写的广泛的东方纪事外,还是头一个欧洲人对马来西亚的记述,情节详尽,涉及许多方面,一两个世纪后都未被超越。多默·皮列士首先是一个热心的观察者,一个敏锐探索的学者,并且是一个忠实、准确和不知疲倦的撰述人——尽管他语言贫乏,甚至不能在早期欧洲记述东方的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有关多默·皮列士的资料,从他刚到印度直至他去世并不缺乏,尽管不很完备;但关于他在葡萄牙的生活却只有一些含糊的记载。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的资料包括如下几种:现存的这部《东方志》、他写的4封信、他签署的5份文件、他和别人共同署名的1封信、同时代人提到他的8封信和另1份文献以及编年史和早期作家的记录。这些可说明如下。

皮列士的信:1512年11月7日从马六甲,致他的兄弟若望·费尔南德斯(João Fernandes),刊布在《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札》,卷Ⅶ,第58—60页;1513年1月10日<sup>①</sup>,从马六甲,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,同上,4—7页;1513年1月10日,从马六甲,致“任何负责任命马六甲官员的人”,同上,66—67页;1516年1月27日,从科钦,致葡萄牙国王。这最后一封信首次公布在《露西塔纳药学会杂志》(*Jornal da Sociedade Pharmaceutica Lusitana*),卷Ⅱ,Ⅰ号,第36页及以下诸页,里斯本,1838年;后再印于《药学报》(*Gazeta de Pharmacia*),里斯本,1866年;并再次刊印在《萨莱瓦主教全集》(*Obras Completas do Cardial Saraiva*),卷Ⅵ,第419—428页,里斯本,1875年。

其他由皮列士签署的文件:在马六甲注明日期的文件,1513年11月12日,其中他作为其姻兄弟迪奥戈·罗柏斯(Diogo Lopes)的遗嘱执行人,《信札》,Ⅶ,99页;在马六甲的收据,1513年12月24日,同上,107页;在马六甲的收据,1514年1月12日,同上,112—113页;在马六甲的收据,1514年5月5日,同上,121—122页;“马六甲官员——致吾人之主国王陛下”的信函,1514年1月7日,签署的有“书记伯洛·萨加杜(Pero Salgado)、多默·皮列士和加西亚·查姆(Garcia Chaym)及经纪人伯洛·伯索亚(Pero Pessoa),同上,Ⅲ,89—91页。

提到皮列士的文献: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(Rui de Brito)的一道命令,1513年11月4日,命皮列士接受其已故姻兄留下的财物,同上,Ⅶ,97页;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,坎纳诺尔,1513年11月30日,同上,Ⅰ,141—150页;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葡王的信,马六甲,1514年1月6日,同上,Ⅲ,91—97页,并见于《国家档案室文献集成》(*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*)第345—350页;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,马六甲,1514年1月6日,《信札》,Ⅲ,216—231页;马六甲船长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,马六甲,1515年1月8日,同上,Ⅲ,133—139页;马六甲船长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致葡王的信,1524年1月1日,同上,Ⅳ,35—42

页；克里斯多弗·维埃拉(Cristovão Vieira)和瓦斯科·卡尔涅(Vasco Calvo)的两封信，广州，1524年，及1524年11月10日<sup>②</sup>。这两封信后来的抄本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(葡文文献，no. 65)<sup>③</sup>，由多纳德·福开森(Donald Ferguson)公布在《印度考古家》(*Indian Antiquary*)，孟买，1901—1902——导言、原文及译文。在里斯本档案室国家档卷中，有一个这两封信中第一封的原文残页(残卷，Maço 24，在中国纸上用中国墨汁写成)，由沃列兹奇博士(Dr. E. A. Voretzsch)刊布于《葡日协会公报》(*Boletim da Sociedade Luso - Japonesa*)，no. I，东京，1929年。

编年史和早期著作中有关的资料：加斯帕·哥赫亚：《印度传奇》(*Lendas da India*)，卷II，第473、528—529、678页，写于16世纪中期；费尔隆·罗柏斯·德·卡斯特涅达：《葡人发现印度的历史》(*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*)，第IV部，iv和xxxI章，第V部，ixxx章，第一版，1554年；若望·德·巴洛斯：《亚洲》，第III卷，第II部，8章，第VI部，1和2章以及第VIII部，5章，第一版，1563年；安东尼奥·高旺：《纪事书》(*Tratado*)，第129—130页，哈克鲁特学会版(第一版，1563年)；达米奥·德·戈鄂斯(Damião de Góis)：《最吉祥的国王唐·曼内奥编年史》(*Chro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om Emanuel*)，第IV部，xxiii和xxv章，第一版，1567年；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：《远游志》，ixv，xci和cxvi章，第一版，1614年；曼内奥·德·法里亚·依·舒萨(Manuel de Faria e Sousa)：《葡人的亚洲》(*Asia Portuguesa*)，第I卷，第III部，3和6章以及附录，7章，第一版，1666年；迪奥戈·巴波萨·马夏杜：《露西塔纳图书馆》，Thomé Pires条，第一版，1752年。

抵达印度前有关多默·皮列士早年的情况，很少有确定的资料。加斯帕·哥赫亚告诉我们，皮列士是国王若望二世(1455—1495)的药剂师之子，而卡斯特涅达说，他曾是阿丰索王子的药剂师。这个王子可能是若望二世不幸的儿子，生于1475年5月18日，死于1491年7月13日。还有一个阿丰索王子，国王曼内奥(1469—1521)的第七子，生于1509年4月23日<sup>④</sup>，但他还不到两岁时皮列士已去了印度，很难是卡斯特涅达提到的王子。

皮列士在赴印度时可能40岁出头。他在1513年1月10日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中抱怨说，就在大约1512年他刚到达前，鲁依·德·阿拉乌约(Rui de Araújo)死后新任命的马六甲经纪人伯洛·伯索亚，年纪太轻，以至

于起初他不愿在此人手下充当书记。他在同一封信中说,马六甲是如此重要,他愿看到那里有“三四个白鬍人照看葡王的赋税”。这说明他当时不再是个年轻人。阿丰索王子 1490 年成婚,时年 15 岁。极有可能当时年轻的皮列士,国王药剂师之子,被任命为这个王子的药剂师。当王子死于 1491 年时,皮列士差不多小于 22 或 23 岁。这有皮列士本人的话为证,当他谈到巴契安(Bachian)群岛时最后说:“我在葡萄牙使用这种树叶,必定足有二十年。”(对开页,158v)如果这样,皮列士大约生于 1468 年,赴印度时约 43 岁,死时约 70 岁,大约死在 1540 年前。

在 1512 年 11 月 7 日致若望·费尔南德斯,他的“同胞兄弟”的信中,皮列士也提到了他的姐妹依莎贝尔·费尔南德斯(Isabel Fernandes),还有玛利亚·哥蒂纳(Maria Godinha),多半是他兄弟之妻,以及安东尼亚(Antónia),多半系甥女,他把她和他兄弟之“妻和子女”分开来。他还提到“迪奥戈·罗柏斯,我的姻兄弟,他在马六甲与我一起,在我住所吃喝和睡觉,有一些财物,是一个很好的骑士和很好的人”。皮列士提及“我的姻兄弟”这种方式,看来表示迪奥戈·罗柏斯是他妻子之兄,信里没有提妻子的名字。皮列士多半是一个鳏夫,这可能是他赴东方的原因。

这是一封致“若望·费尔南德斯先生,在波尔塔·达·马德勒纳(Porta da Madalena),我的兄弟”的信。可能皮列士也曾在那里居住。波尔塔·达·马德勒纳在旧宫殿广场(Terreiro do Paço)东北角不远处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商业广场(Praça do Comércio),英人称之为黑马广场,靠近商贾新街(Rua Nova dos Mercadores),当时是里斯本的主要商业街,靠近今天的商业街。这条街上有几家药店,可能其中一家或者邻近的另一家属于皮列士或其兄弟,或者属于二者共有。法里亚·依·舒萨说,多默·皮列士必定出生在葡萄牙的莱里亚(Leiria)镇,因为费尔隆·曼德斯·品脱 1543 年在中国发现他的女儿用那个镇的名字作为别名。但这纯系猜测。

在同一封信中,皮列士两次提到“佐治·德·瓦斯康塞罗先生(Senhor Jorge de Vasconcelos),因为我得到了他的帮助,所以很感激他,犹如因同胞关系我感谢你”。佐治·德·瓦斯康塞罗是“米纳和印度局”(Casa da Mina e India)的局长即管理者(provedor),这个机构负责管理葡萄牙海外事务——今天殖民部的前驱。他还说他附有一封信给迪奥戈·罗柏斯医生(Dr. Diogo

Lopes),多半是首席皇室医生,皮列士可能当了阿丰索王子的药剂师后跟他有所接触。很自然地,皮列士在这两个重要人物的保护下赴印度。在1513年1月10日致奥布魁克和致“任何负责任命马六甲官员的人”的两封信中,皮列士说在里斯本,国王——写信给奥布魁克推荐他负责第一家将设立的经纪行——已派遣他作为药物经纪人(feitor das drogarias),从他在里斯本登船之日算起,每年有三万来依(reais)和二十京塔尔(quintal)的药物供他支配,并有三个人为他工作,他把他们带到印度。他还负责一所药房(供应药物),值四千或五千来依,这已送往印度。

赴马六甲前在印度——在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之侄唐·加西亚·德·诺洛纳的指挥下,一支六艘船的舰队,于1511年3月和4月离开里斯本。在这支舰队之前,一支三艘船的舰队,由若望·塞尤(João Serrão)率领,于1510年8月离开里斯本;再后一支于1512年3月离开里斯本。唐·加西亚·德·诺洛纳舰队中的一艘船贝岭(Belém)号(据巴洛斯说它是海上所见最美的一艘船)在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(Cristóvão de Brito)的指挥下,于4月20日驶离里斯本,并于1511年9月8日抵达坎纳诺尔(Cannanore)<sup>⑤</sup>。海军司令唐·瓦斯科·达·伽马(D. Vasco da Gama)的兄弟唐·艾列士·达·伽马(D. Aires da Gama)同时乘皮达德(Piedade)号航行,但他后来和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的船分开,并于9月7日望见瓦克塔(Bhaktal)之后,驶往坎纳诺尔。<sup>⑥</sup>皮列士应当乘这些船中的一艘前往印度,因为据巴洛斯,这是1511年唐·加西亚·德·诺洛纳舰队中仅有的抵达印度的两艘船。皮列士在1512年11月7日和1513年1月10日的信札中表示,当奥布魁克征服马六甲后于1512年2月初返回科钦时,他不曾在坎纳诺尔久留。在致他的兄弟和致奥布魁克的信中,皮列士说大总督曾召他从坎纳诺尔——他是那里的“药物经纪人”——去科钦。在1516年1月27日的信中,皮列士说:“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和唐·艾列士的船把一些茵陈运往葡萄牙,这是我还在葡萄牙时若望·达维拉(João Dávila)购买的。”这些船一到印度就装货,在1512年8月返回葡萄牙。看来茵陈在运往葡萄牙之前收购不多,而如果皮列士当时仍在那里,到1511年末则已在印度,那么他除克里斯多弗·德·布里托和唐·艾列士·达·伽马的船外,不可能乘别的船。可以有把握得出结论,皮列士于4月20日离开里斯本,1511年9月8日,或一两天后抵达印度。

在 1513 年 11 月 30 日的信中, 奥布魁克告诉国王, 他在马六甲任命的某些战利品看守人(*quadrilheiros*)发现有骚乱和违法行为。有鉴于此, 他决定, 当他了解情况后, 派去“多默·皮列士, 王子的药剂师, 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个勤奋的人, 因此他, 和鲁依·德·阿拉乌约——奥布魁克把他留在马六甲当经纪人——一起, 还有船长可以调查该事件”。皮列士在印度住了八九个月后, 于 1512 年 4 月或 5 月, 乘桑托安德列(*Santo André*)号<sup>⑦</sup>, 与桑托基督(*Santo Cristo*)号一道从科钦赴马六甲。据 1513 年 1 月 10 日他致奥布魁克的信, 看来这两艘船恰在科钦海外遭遇了恶劣天气, 一些货物不得不抛入海中, 包括属于皮列士的价值超过四百克鲁渣杜(*Cruzados*)的货。

桑托基督和桑托安德列号于 6 月或 7 月, 在经纪人鲁依·德·阿拉乌约死后不久抵达马六甲。<sup>⑧</sup>1512 年 11 月 7 日致其兄弟的信, 是我们得到的有关皮列士在马六甲居留情况的第一份文献, 其中他说: “我在马六甲当经纪人(*feitoria*)的书记和药物的监察人(*veador*)及会计师(*contador*)。”他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富有, “超出你所能想像的”, 尽管他从桑托安德列号船上抛弃了价值超过四百克鲁渣杜的货物, 后来还在致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里抱怨他的工资低。他要求后者除了他作为药物经纪人或监察人的三万来依工资外, 再付给他五万多来依, 作为他任书记工作的报酬。他还抱怨说他曾长时间发烧在床: “我病得很厉害, 在床上躺了两个月。”这说明他给他兄弟写信时刚病了一场。他的姻兄弟, 迪奥戈·罗柏斯, 1512 年 11 月跟他住在一起, 但在 1513 年 11 月 4 日, 罗柏斯去世, 皮列士是他的遗嘱执行人。

1514 年 1 月 6 日, 马六甲船长鲁依·德·布里托致函国王曼内奥和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, 告诉他们, 在 1513 年 3 月他已派遣了一支四艘船的舰队到爪哇去取香料。舰队由若望·罗柏斯·德·阿尔云(*João Lopes de Alvim*)指挥。三艘船(*navios*)是圣克里斯多弗(*São Cristóvão*)号、桑托安德列号和一只轻快帆船, 分别由弗朗西斯科·德·梅洛(*Francisco de Melo*)、马丁·克德斯(*Martim Guedes*)和若望·达·西维埃拉(*João da Silveira*)指挥。布里托补充说: “多默·皮列士, 这所经纪行的书记及会计师, 作为舰队的经纪人去监管货物。”舰队在 1513 年 3 月 14 日驶离马六甲, 于 6 月 22 日载着大约一千二百京塔尔丁香返回。从他对爪哇的叙述(对开页 148—155)——“尽我可能作调查研究, 跟许多人核对我的事实”——我们看到皮列士访问过该岛的北岸, 至少到过

从井里汶(Cherimon)到格利西(Grisee)之地。当提到苏门答腊西北岸的港口巴鲁斯(Baros)时,他说:“我深入这个岛大约 15 里格。”这显然是不同于赴爪哇的另一次旅行,但我们不知道它发生的时间。皮列士多半写了,或至少打算写另一部有关东方“各个不同地方称量和度量”的书,这是当提到“爪哇的钱币和称量”(对开页 150v)时所表示的;但即使他写了,现在也已遗失。

1513 年 11 月 12 日和 12 月 24 日的两份文献及 1514 年 1 月 7 日、1 月 12 日和 5 月 5 日的另三份,表示皮列士当时在马六甲;在 1515 年 1 月 27 日尼纳·查图(Ninachatu)死时,他仍在那里,如《东方志》最后一页所记载。但那个日期后不久他必定去了科钦。马六甲新船长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在 1515 年 1 月 8 日致国王曼内奥的信中,提到中国和交趾支那以及暹罗、浣泥、吕宋和“有钻石矿的丹戎武嘞(Tamjunpura),多默·皮列士将充分地对这些事做出解释”。这自然指的是《东方志》。看来皮列士在奥布魁克写这封信的同时,于 1515 年 1 月 27 日后马上乘两艘在 2 月末抵达科钦的船只中的一艘,离开了马六甲。我们是从两份文献——日期为 1515 年 2 月 30(原文如此)日和 3 月 3 日——得知这两艘船到达的,其中科钦的船长伯洛·德·马斯卡列纳斯(Pero de Mascarenhas)命令为一只艇(atalaia)准备一些粮食,以备遣往果阿,并附上马六甲的消息给阿丰索·德·奥布魁克<sup>⑨</sup>。

返回印度和出使中国。从前引佐治·德·奥布魁克的信,我们看到皮列士离开马六甲,打算返回葡萄牙。但皮列士的命运则另写在天命之簿上。奥布魁克于 1515 年 2 月 21 日从果阿驶往忽鲁模斯,在大约十个月后才返回,12 月 16 日死在果阿。同时印度新大总督罗波·索阿列斯·德·奥伯加里亚(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)已于 4 月初率一支 13 艘(或 15 艘)船的舰队离开里斯本,在 1515 年 9 月初抵达果阿。他在那里前往坎纳诺尔和科钦,于 9 月末之前抵达。随同新总督到来的有费尔隆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(Fernão Peres de Andrade),国王派他当一支舰队的大船长,从印度“去发现中国”,并携带一位葡萄牙使臣去那里。

卡斯特涅达告诉我们“葡萄牙国王没有[从葡萄牙]派遣使臣,因为,据认为中国国王在附近,所以他命令费尔隆·伯列士把他的一个船长派往那里,或者派他所选中的任何人。而总督除这个多默·皮列士外不愿派别的人,他按印度贵人和船长们的意见派遣他去,因为这个多默·皮列士曾是唐·阿丰索王子的

药剂师,并且持重和勤于学习,也因为他对中国的药物懂得比别人多”。另一方面哥赫亚说,再度赴果阿并于1516年2月返回科钦的总督,“根据他奉的命令派费尔隆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赴中国;同时随他派去一位多默·皮列士,国王若望的药剂师之子,他的好友;也因皮列士很精明,很希望了解印度的事”<sup>⑩</sup>。这样,看来总督早已是皮列士的老友,这是影响他选派如此重要使节的因素,尽管皮列士是一个百姓,一如编年史家不忘加以强调的。总督必定是在9月末首次抵达科钦遇见皮列士时,才选择他的。迨至当时,皮列士肯定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,他想在离别几乎五年后返回葡萄牙,但亲自去看看广大而神秘的中国——他在马六甲已听闻了许多有关它的事——的愿望以及再额外增加他财富的可能性,必定强有力地吸引着他。此外,他可能曾对奥布魁克不满,后者利用他的才能,但从不把他从普通书记职位上提升,尽管他的抱怨和请求是很正当的。据哥赫亚说,奥伯加里亚是奥布魁克的仇敌、皮列士的朋友,可能在里斯本已经有力地推荐过他。到这时,皮列士已完成或正在完成《东方志》,这不仅深深打动了新总督,也打动了卡斯特涅达提到的许多“印度的贵人和船长”。还不要忘记,皮列士及其父亲,虽然出身贱微,但曾直接与宫廷接触,肯定比当时在印度的大部分葡萄牙贵人受过更多的教育。在致其兄弟的信内,皮列士曾提到“我受到的娇养和宠惯”。巴洛斯说:“这位使臣……叫做多默·皮列士,罗波·索阿列斯在印度挑选他任这职位,尽管他不是很有身份的人,不过是一个药剂师。在印度工作,选购药材运往本国,他却最有才能负担这一使命。这除了由于他的专技优势及天生爱好文学,也因为他的才干以及他做生意之豪爽老练,他还很好奇地探索和认识事物,对所有事都有灵活的头脑。”所以,选择平凡但聪敏、勤勉、有经验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皮列士担任出使未知中国的重任,看来不像后来某些编年史家多半认为的那样意外。

虽然皮列士在1515年1月末离开马六甲,有意返回葡萄牙,但他在1516年1月27日的一封信,“关于药材及其生长之地”,却明白地表示他不打算马上返回。由此我们能够推测,在总督于1516年2月再度赴科钦之前,皮列士已知他将赴中国。

从科钦到广州。奥伯加里亚于1516年2月返回科钦,他派费尔隆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率一支四艘船的舰队前往中国<sup>⑪</sup>,使臣多默·皮列士随队而去。这支舰队先访问苏门答腊的巴昔(Pase)港,商人乔安妮·英波勒(Joannes

Impole, 乔万尼·达·英波里[Giovanni da Empoli]), 一个为葡萄牙服务的佛罗伦萨人, 有一艘船加入舰队, 该船在那里装载胡椒前往中国。但英波勒的船着火了, 货物丧失, 所以安德拉吉决定, 在访问马六甲后, 他要先去孟加拉, 再赴中国。然而, 马六甲的船长佐治·德·布里托坚持要安德拉吉及其舰队立即去中国, 因为他担心头和另一些葡人乘一艘容克<sup>⑧</sup>去那里的拉法尔·伯列斯特列洛(Rafael Perestrelo)。因为季风时期已过了很久, 安德拉吉不情愿地于 1516 年 8 月 12 日<sup>⑨</sup>乘桑打巴巴拉号(Santa Barbara)船驶往中国, 同行的安东尼奥·罗波·法尔考(António Lobo Falcão)乘一艘帆船, 曼内奥·法尔考(Manuel Falcao)乘另一艘, 杜阿特·科埃略(Duarte Coelho)乘一艘容克。舰队在交趾支那海岸外遇到了恶劣气候, 船只遭到了损坏。这是在 9 月中旬, 于是安德拉吉决定返回马六甲。容克前往暹罗, 杜阿特·科埃略曾去过那里; 另三艘船在海岸获得淡水后, 经普罗·康多尔(Pulo Condore)和北大年(Patani)南航。

当安德拉吉抵达马六甲时, 他发现伯列斯特列洛已从中国获取大利返回。他决定推迟他的孟加拉之行, 并在 12 月去巴昔装运胡椒, 以便在季风许可时赴中国。他在 5 月返回马六甲, 发现佐治·德·布里托已死, 在布里托之姻兄弟努诺·瓦兹·伯来拉(Nuno Vaz Pereira)和海上大船长安东尼奥·帕切科(Aitónio Pacheco)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, 因为两人都要继承该城堡首领之位。给他们调解无效后, 安德拉吉于 6 月带一支八艘船的舰队离开马六甲。卡斯特涅达对它作了如下的描述:“(安德拉吉)指挥埃斯柏拉(Espera)号, 一艘大约二百吨的船, 西蒙·德·奥卡索瓦(Simão de Alcáçova)乘桑打克鲁士(Santa Cruz)号, 伯洛·索阿列斯(Pero Soares)乘桑托安德列号, 佐治·德·马斯卡列纳斯(Jorge de Mascarenhas)乘圣地亚哥(Santiago)号, 佐治·波特洛(Jorge Botelho)乘一艘马六甲商人库利亚罗阁(Curiaraja)的容克船, 曼内奥·德·阿拉乌约(Manuel de Araújo)乘另一艘[马六甲商人]普拉塔(Pulata)的容克以及安东尼奥·罗波·法尔考乘自己的一艘容克; 因此赴中国的是一支七艘船的舰队。”巴洛斯则说有第八艘由马丁·克德斯指挥的船<sup>⑩</sup>。

船队在 1517 年 8 月 15 日到达屯门(Tamão 即 Tumon)岛<sup>⑪</sup>, 约在广州河入口处, 曾遇上在该岛外游弋以备海盗的一支中国舰队。中国人向葡人射击, 没有造成伤害, 然而, 安德拉吉没有还击, 而是做出了各种和平友好的表示。所有编年史家相当长和极详细地描述了安德拉吉及其舰队, 从抵达屯门起, 直到多